

願以所修福慧回施有情—— 讀《玄奘西遊記》

書目：玄奘西遊記

作者：錢文忠（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出版社：INK 印刻出版

初版日期：2007年12月



◎ 陳志遠／主理所刊版

閱讀這本《玄奘西遊記》是份在書店漫遊間偶然覓得的機緣，進而為這本原先為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之「玄奘西遊記」講演結集的冊子，書寫評介，亦是另一份偶然遭逢的緣分。

「讓專家、學者為百姓服務」、「在學者和百姓之間架起一座橋樑——一座讓專家通向百姓的橋樑，進而達到普及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目的」，這是「百家講壇」的設立宗旨，若以這個宗旨粗略作為評析本書的基準，筆者以為，這本《玄奘西遊記》已是座造型優美且結構完整的橋樑。雖然，現我仍無緣得見電視講演的画面內容，僅透過文字的閱讀，適足以令筆者反覆咀嚼，思索再三。

本書最簡單卻也最困難的一項任務即是「還原一個真實的玄奘」，使得玄奘的生命風景和中印佛教史悠遠深刻的影響能從中國四大名著之一的《西遊記》作者吳承恩筆下那位「念緊箍咒令孫悟空在地上打滾」的個體唐僧，脫胎換骨，使現代閱聽人和讀者皆能窺見玄奘法師的巖山真面目。

作者錢文忠先生，現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無錫錢家之後，筆者記憶所及，史學大師錢穆、國學大師錢鍾書和航太學家錢偉長皆出自此案，作者其家學淵源，不在話下，加以錢教授師從現已年逾九旬的東方學大師季羨林先生（作者為季先生之關門弟子），專攻梵文、巴利文、留學德國漢堡大學印度與西藏歷史文化學系，主修印度學、藏傳佛教學和伊朗學。單就錢教授的學術背景而言，「還原一個真實的玄奘」，這件工作剎那間變得輕巧許多。

本書作者以其深厚的梵文基礎，轉譯中國古籍文言並能深入作者內心世界的透徹，透過作者對兩部與玄奘法師生命歷程緊密相連的書籍的嫺熟理解，一是唐太宗命其書，由玄奘法師口述，弟子辯機所筆錄的《大唐西域記》，二是由嫡傳弟子慧立、彥琛根據追隨法師時的見聞進而寫成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輔以《舊唐書》、《續高僧傳—玄奘傳》、《玄奘年譜》、《玄奘譯撰專輯》等書籍，近乎是完成了一幅立體有動人的玄奘圖像，而不再是隱身於三位高知名度的徒弟，孫悟空、豬八戒和沙僧淨身後的平凡僧人。

書本的內容架構而言，共分三十六節，始自「玄奘身世」，止於「法師圓寂」。開始時，作者

就以西遊記第十一回中當中的一段關於唐僧身世作為引子，經由與真實歷史記載相互對照，學盡了一個與小說筆法迥然不同的搭人空間，利於安置「還原一個真實的玄奘」的工作。

玄奘法師，俗名陳祿，祖籍潁川（今河南許昌），生於西元六百年（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卒於西元六六四年（唐高宗麟德元年）。父母早亡，隨二哥在洛陽淨土寺開始學佛，十三歲時便敢參加選拔僧人的考試，巧遇一位大理寺卿，這位大臣見玄奘相貌不凡，便問他說：「你為什麼要剃度出家呢？」他回答道：「意欲追紹如來，近光道法。」年幼的玄奘法師心中便立下大志。綜觀本書，「追紹如來，近光道法」，筆者認為這八個字即是本書的主軸。一位十三歲的孩童，即有這樣理想，在往後的人生歷程中，踏實實踐，其堅定向佛之心，實令筆者由衷欽佩。

小說中，唐僧是奉旨西行取經，史實則是記載著一千四百年多前，玄奘法師遍遠長安雷害，作物歉收。唐太宗下令「開豐四出」，才得以離開長安，通過層層軍隊駐防的邊關，「偷渡成功」，並在一匹「瘦老赤馬」的引領之下，透過大漠，途經西域各國，歷經許多飢餓和磨難，方得以順利抵達印度，繼而成為一名影響中印兩國文化交流和歷史的傳奇留學生和一代高僧。

玄奘法師透過《大唐西域記》，使後人對於當時西域各國的風土民情及當時他自身如何運用辯才智慧得以化解諸多困境，有了深入的認識。舉例而言，在第十講「異國傳奇」中所談論的龜茲（今新疆阿克蘇地區庫車縣），與當地高僧的辯經過程，即可見其辯經技巧和辯經策略的高明。法師也談到了龜茲人「以鬚鬚為美」，並觀察到龜茲「管絃伎樂，特善諸國」，經過康國，也就是今日的撒馬爾罕，法師寫道：「機巧之技，特工諸國。」然而，使筆者驚艷的是，法師見到了昔在阿富汗境內的巴米揚大佛，並在《大唐西域記》為大佛留下了現世唯一的紀錄：「王城東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是曜，寶飾煥爛。東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伽藍東有（金俞）石釋迦佛立像，高百餘尺，分身別鑄，總合成立。」無奈於西元2000年3月，塔利班政權因宗教因素以炸藥將大佛開闢化為灰燼，使其終成了千年一嘆。不同宗教相互包容，何其難也？

在佛經翻譯事業上，玄奘法師的成就更是可觀。起初，佛經是口耳相傳，進而以梵文加以書寫和紀錄，作者指出，最初佛教並不是由印度直接傳到中國，而是通過了今天的新疆，以及中亞無數的小國和民族間接傳入的。因此，最早傳入中國的佛經原本不叫「梵本」而叫「胡本」。在當時玄奘法師的心目中，印度的佛教和梵文寫就的佛學經典，才是心嚮往之，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唐僧西天所取的經為「真經」的真義。留學印度那爛陀寺期間，玄奘法師隨戒賢法師修習大乘佛教經典《瑜珈師地論》外，亦大量修習《中論》、《百論》、《聲明》等佛學典籍以及許多婆羅門經典，並且厚植自身的梵文基礎，為日後返回長安的譯經事業奠下了牢固的根基。透過本書，我們能進一步認識到玄奘法師之所以在漢譯佛經能有卓越的貢獻，在於以下幾個層面：一是對於梵文的高度掌握與佛教教理的全面了解。其二，譯經團隊的成員，皆乃一時之選。再者，梵文佛經的質量超乎其他朝代。先前提過，梵文佛經才是所謂的「真經」，玄奘法師經由在印度留學多年的經歷，帶回了許多梵文佛經（雖在返途中遇難遺落若干珍貴原典），本書作者有以下的比喻：「假若唐朝的漢譯佛經是漢譯佛經的皇冠，玄奘翻譯的佛經就是皇冠上最耀眼的那顆明珠。」足見本書作者對於

玄奘法師譯經其質量的推崇了。第四，譯場組織的嚴密以及翻譯律例的進步。整體而言，玄奘法師所具備的譯經條件之強是他人所無法比擬的。

閱讀本書的過程中，帶給我的閱讀興味是對於「觀世音」與「觀自在」兩個名號的辨析。在時人現所經常誦念的「觀世音菩薩」，原是來自於錯譯。正確的講法應該是「觀自在」，關照和領悟自在本身。阿耨盧鞞囉，是Avalokitesvara的音譯，avalokita（義為「觀」），isvara（義為「自在」），在這點上，玄奘法師的梵文功力較另一位漢譯佛經大家鳩摩羅什（他是龜茲人）來得高明。鳩摩羅什恐將Avalokitesva讀成了Avalokitasvara，svara（義為「聲音」），於是譯成觀世音，「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即為其代表作。即使是錯譯，經過長時間的沿用，中國和日本的民間，也仍多持念「觀世音」，在畫家吳昌先生著作《三十三章札記》中對於「觀世音」及「觀自在」兩個名號亦有分析，「習慣成自然」，自然的力量，的確是沛然莫之能禦。

日前，在《聯合報》一篇單國璽臨機主教和法鼓山聖嚴法師對談生死的報導中，聖嚴法師談到玄奘法師，他說：「釋迦牟尼佛度眾生，他一生多苦難；玄奘印度留學取經，歷八十多難。這些高僧都是由艱苦走出來的。又好比台灣的印順導師，一生與打針、吃藥結下不解緣，投入佛學研究，在他百歲的生命中，成就很大。」使我不禁想起了孟子所言「天降降人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能，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實言之，或許不一定每個人都需要成為承擔「大任」的人，但我們都不乏遭遇困厄與挫折時，信心動搖的試煉經驗。在閱讀過程中，筆者經常望著夾頁中的「玄奘負笈圖」，不禁遙想，大漠之中，一位千山獨行的旅人，何來的精神力量驅使他堅定不移地西行印度求學，實現兒時宏願呢？在法師圓寂前所留的一段遺言，清楚地告訴世人，他自身精神力量的來源，「願以所修福慧回施有情」，簡潔而深刻的十個字，銜接起了「這般如來，近光道法」的誓願。玄奘法師的精神力量，同單國璽主教與聖嚴法師對抗病魔並能不中斷向世人弘法工作的「願力」，如出一轍。

「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看似順遂和璀璨的人生旅程，玄奘法師亦有缺憾和遭致世人批評之處。他也曾經歷了如同孔子痛失顏回的遭遇，高徒早逝。晚年，更在已取得唐朝皇家的高度信任下，對於一位來自印度恐有不同派別的僧人欲至長安發展譯經事業的強力阻制，是否真應驗如時人所言：「在實際生活的人本就是一堆矛盾（a bundle of contradictions）」？

二十一世紀初葉，宗教衝突不斷的危局，依然未解。一千四百年後重新親近玄奘，循著他的步履，閱讀著其所留下的漢譯佛經遺產，體會到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學習與理解，並不容易。需要不斷地交流，也需要許多「兩腳踏東西文化」的橋樑。文末，筆者憶起當代另一位高僧，達賴喇嘛，他認為這個時代有一個關鍵字：「對話」（dialogue）。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比鄰而居且相互依存，經過對話，從歧異中尋求共同解決的方案，「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適先生曾有所言，盼諸讀者既能不誤讀了這段話，並能思索出其中的積極意義。